

论新东方政策对欧洲一体化的促进作用

王芳芳

(西北师范大学 文史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二战后,德国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在国际社会仍有“政治侏儒”之虞。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联邦德国随之调整外交政策,实施“新东方政策”。联邦德国领导人勃兰特始终把欧洲联合与实施新东方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不仅缓和了东西方紧张局势,而且促进了欧洲一体化的发展,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深为新东方政策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和安全保证。

【关键词】新东方政策;欧洲联合;欧洲一体化;关系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2-0087-04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会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作为国际环境的外因有时对国家外交政策起着主导性的作用,这一点对德国外交政策来说,表现得尤为突出。二战后德国分裂,联邦德国一直不承认民主德国,视其为德国东部领土,并于1955年开始推行哈尔斯坦主义,声明联邦德国不同东德建交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60年代起,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美国的霸主地位受到了苏联的有力冲击,美苏对峙陷入僵局。1969年10月,联邦德国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第一次下野,社会民主党和自由党组成联合政府,维利·勃兰特出任总理,随之调整了其外交政策,出台了“新东方政策”。它突破了哈尔斯坦主义的困境,揭开了战后联邦德国外交的新篇章。其本质是“以接近求改变”,迈出二战后德国统一的第一步,被称为“社会民主党执政后的一件杰作”。^[1]

一 新东方政策与欧洲防务一体化

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和防务策略是密不可分的。新东方政策与欧洲防务一体化甚是如此的。新东方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承认欧洲各国边界现状;承认民主德国,但不是按照国际法来承认,民主德国也不应该把联邦德国当外国,即所谓的“两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论;裁减美苏在两个德国领土上的兵力;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又与欧洲防务一体化紧密相连,它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欧洲一体化是二战后欧洲政治、经济生活的主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德国扮演了核心成员的角色。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和欧洲的联合防务只有融入欧洲一体化,才能实现经济的繁荣和政治上的重新统一。欧洲防务离不开联邦德国,联邦德国的安全更不能绕过欧洲防务一体化,欧洲联合防务是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一

环。

在欧洲历史上,欧洲联合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而是一个古已有之的宏伟理想。“欧洲是历史上最早提出搞地区联合,欧洲统一的历史几乎和欧洲的历史一样久远”。^[2]欧洲联合可追溯到18世纪法国圣皮埃尔设计的方案。20世纪初欧洲联合运动频起,出现了库当霍夫-卡来吉和法国外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提出的“欧洲联盟”计划。^[3]20世纪50年代以前,欧洲联合一直流于形式,并未实质性进展。战后欧洲一体化是欧洲联合在现实层面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美苏冷战使西欧成为东西方对峙的前沿阵地,西欧要想获得安全,只有选择西欧联合之路,与美国结成同盟,共同对付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威胁。夹在两个对手间的西欧,对由于力量对比不平衡产生的不安全感和对可能发生的冲突的担忧与日俱增,西欧必须考虑其安全战略。从联邦德国成立至60年代,阿登纳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带有明确的依附集团的特点,并受制于美国和其他盟国。阿登纳在回忆录写到:“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相信只有执行一种和西方紧密而坚定的结盟政策,才能有一天使德国在和平和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4]所以,在阿登纳时代,联邦德国的安全和防务方面,只能依附别人,必须服从超级大国的利益。居·德卡摩亚说过,“在防务和安全方面,欧洲人习惯于依赖别人,并以为这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5]基辛格在一篇演说中说过:“一个民族如果把自己的安全交给别人去掌管,这个民族就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了。”^[6]

20世纪50年代,路德维希·艾哈德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出现了“经济奇迹”繁荣局面。随着绝对国力空前增强,谋求独立自主的外交是其重

收稿日期:2011-03-04

作者简介:王芳芳(1986-),女,甘肃庆阳合水人,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史。

要目标。新东方政策是其成功典范。联邦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处于前沿阵地,在八百公里的边界线上同苏联帝国的东欧部分直接接壤,是保卫东欧的堡垒,对于欧洲安全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欧洲的安全问题,在颇大程度上取决于联邦德国所实行的对外政策。勃兰特把欧洲防务一体化与新东方政策结合在一起,即通过欧洲的一体化来实现联邦德国的外交目标。他认为,一体化作为欧洲防务的根本原则,可防御德国,欧洲防务目标即可实现。概括地说,在这个一体化的结构内,新东方政策追求三重目标:

1、追求自身安全和西柏林安全。

2、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西方共同体,即与欧洲煤钢联营、原子能联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欧洲经济共同体联合起来。

3、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进行合作,以便改善民族分裂的局面。

联邦德国“缓和”“统一”的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的均势策略密不可分。均势指“没有一国处于优势地位或能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状态”。^[7]德国著名记者、政治家彼得本德尔说,统一、缓和和均势之间形成了“周而复始的规律”：“统一以缓和为前提；缓和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均势为前提。”^[8]施密特也认为,只有建立在力量均势的基础上,缓和政策才能成功,安全才能得以实现。20世纪70年代欧洲均势局面及其均势战略,为处境艰难的联邦德国外交政策及安全开辟了一条宽阔的光明大道。

联邦国防务政策具有两重性:首先是比较明确地依赖于它的盟国和西欧联盟;其次是方针和态度方面的两重性。德国既想促进欧洲防务的一体化,又无条件地忠于大西洋联盟。对联邦德国来说,大西洋联盟和欧洲一体化并不是两个进程,它们紧密相连,是一个进程的两个方面。联邦德国必须把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纳入其外交政策轨道,为其在缓和与均势环境中推行新东方政策提供安全保证。可见,欧洲一体化及西方盟国的支持对其实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对于新东方政策,美国和其他盟国口头上都表示支持,然而内心却心存疑虑,担心德国“中立化”。法国总理蓬皮杜则直截了当的提出“中欧中立化问题”。他说:“实现欧洲的中立化,就算是非武装的中立化,凡能导致中欧中立化的任何因素,都肯定使法国感到不安。”^[9]尽管法国对新东方政策有点不安,毕竟“蓬皮杜对其态度是中立的。”^[9]针对盟国的担心和疑惑,勃兰特一再重申联邦德国不会

离开西方,不会“偏离欧洲方向”,保证德国不会同苏联东欧国家达成任何有损于与西方联盟的协议。勃兰特称,“我们的民族利益不允许我们站在东西之间。我们国家需要同西方保持合作和协议的关系,需要和东方实现谅解。在这种背景下,我着重强调,德国人民需要和平,确切地说,需要同苏联东欧各国人民和平相处。”^[10]勃兰特的辩白消除了西方的疑虑,赢得了盟国的支持。

新东方政策的出台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使欧共体获得了内外推动力,使加强政治合作主要是外交政策的协调合作作为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提上了历史日程。新东方政策开创了东西欧合作的精神,必将有力地推动一体化进程的深化。

二 新东方政策与欧洲政治一体化

欧洲一体化进程从经济一体化开始,《罗马条约》的签订,使欧洲一体化发展驶上了快车道。但是欧洲政治一体化明显迟于经济一体化。1954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否决了旨在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的“普利文计划”,因而中断了正在起步的建立欧洲政治共同体的谈判。60年代末70年代初,欧洲一体化最主要的成就是形成了被看作是欧洲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滥觞的欧洲政治合作机制。^[11]新东方政策的实施,加强了西欧政治合作主要是外交政策的协调合作,推动了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

经由1969年海牙会议,1970年5月的达维农报告和1973年的哥本哈根报告,欧洲政治合作体制初步形成。1969年12月在海牙举行六国峰会,会议始终在充分合作与友好气氛中进行,共同体成员国就农业政策取得了一致性安排,并提出了加强西欧对外政策合作的问题。共同体各国还确立了要加速欧洲一体化进程,联邦德国提议,欧洲不仅要在经济上一体化,而且还要加强政治合作。在联邦德国的建议下,各国外长成立了达维农委员会,正式讨论一体化问题。5月,委员会提出了达维农报告。该报告规定:进行持续的政府间协调,以确保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在外交机构代表之间举行会议,以加强成员国在重大国际政策问题上的一致性。它旨在建立欧洲政治联盟,并建议扩大外交领域的合作。达维农报告批准通过,欧洲一体化迈出了第一步。在欧洲联合的氛围下,“短期内新东方政策达到了与苏联和华沙关系的缓和,既符合德国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理想,又对欧洲的缓和及安全产生重大作用。1970年8月12日,正是达维农报告讨论时期,苏联与联邦德国签订了《莫斯科条约》。该

条约开创了德国和苏联历史的新局面,构成了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实现东欧、东德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在苏联谈判的过程中,联邦德国就着手与波兰进行谈判。经过谈判两国在华沙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联邦德国明确表示承认波兰西部边界的不可侵犯性。1973年3月19日,勃兰特前往民主德国的埃尔富特,会见了东德总理斯多夫,这是两国政府平等的会面,为改善两国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12]1971年9月3日,四大国签订《四方协定》。这些条约为1972年12月21日两德《关系基础条约》的签订奠定了基础。该条约规定,“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相互之间正常睦邻友好关系”,“两国中任何一方在国际上都不能代表另一方或另一方名义行事”,“两国中的任何一国管辖权都只限于本国领土内。”^[13]以上这些条约的签订,无疑对缓和紧张局势十分有利。

1972年10月在巴黎召开九国首脑会议,提出了向欧洲联盟过渡的问题,九国表示协调彼此的对外政策目标。欧洲政治上的成功合作,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于1973年同时加入联合国,增强了国际影响力,为实现其外交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对新东方政策不仅是一种认可或援助,而且它对波恩以外推行的外交政策建立了一个潜在的重要平台。^[14]

1973年2月,哥本哈根举行欧共体首脑会议。会议就欧美关系各个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和讨论,提出了“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个著名口号。会议发表的“欧洲同一性”文件。文件称欧洲要在世界事务中起积极作用,并且要团结起来,越来越多地用一个声音说话,并谋求“在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发展合作”关系。此会议标志着西欧力量迅速崛起和政治合作体制初步形成。新东方政策的实施表明,联邦德国乃至整个西欧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出发,既扎根于西方,又自主地与苏联东欧发展关系的普遍动向,从而揭开了德国外交和欧洲一体化的新篇章。

三 新东方政策与欧洲经济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体化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与新东方政策的实施是密不可分的。1968年爆发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金融货币危机,共同体成

员国意识到稳定货币的重要性。1969年海牙会议上,六国决定制造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保护共同市场不受货币差价和经济危机干扰。1970年10月出台了维尔纳报告,旨在建设经济和货币联盟。该报告联邦德国做出一定的让步。因为此时,德国与东方集团谈判正处于关键时期。为了加强在谈判中的份量,德国必须维持并加强同西方的团结,勃兰特表示“我们希望在西方取得进展,这正有利于我们的东方政策”。^[15]

维尔纳报告预言货币联盟要分散阶段完成,重点在第一和第三阶段,要求于1980年前完成,但对于中间阶段无具体时间规定。第一阶段将于三年内完成,中心认为是缩小各国货币兑美元的波动幅度,建立货币合作基金以帮助各国稳定汇率。第三阶段要求达到经济货币联盟的最终目标,建立共同体中央银行体系,建立一个超国家共同体经济政策中心。但是,维尔纳报告中超国家倾向遭到了法国戴高乐分子的强烈反对,迫使共同体对其妥协让步。

联邦德国一开始经济货币联盟的成果必须要实现政治目的,是实施维尔纳报告中第一阶段的前提条件。正如勃兰特1971年在巴黎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德国对建立经济货币联盟真的没兴趣,只在乎经济货币联盟的政治意义。德国的让步既消除了盟友的误解,也赢得了对新东方政策的支持,促进了欧洲经济一体化。只有这样,联邦德国才能加深欧洲一体化为其实施新东方政策获得安全保证。《经济学家》对此评论说:“维利为他的东方政策付出了沉重代价,欧洲经济一体化终于取得进展。”^[16]

新东方政策抛弃了二战后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及哈尔斯坦主义,开辟了德国外交新领域,打破了同东方的隔绝状态,迈出了同东德改善关系的第一步,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新东方政策缓和了欧洲冷战局势,降低了对美国的依附程度;在经济上,它扩大了东西间的贸易,为德国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外交上它使联邦德国摆脱了孤立状态,为德国在东西方提供了广阔的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新东方政策实施的过程,极大地推动了欧洲一体化进程。

注释及参考文献:

[1]张契尼,潘琪昌.当代社会民主党[M].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161.

[2]李世安,刘美云.欧洲一体化[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2.

[3]Stephen.J.Lee:Aspects of European History 1789-1980.Economic and political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since

- 1945, London and new york, p293-305.
- [4] 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中译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48.
- [5] 居·德·卡摩亚.欧洲的命运[M].巴黎,1952:260.
- [6] 基辛格1975年11月24日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演说(罗马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第228期公报).
- [7] 赫德利·布尔.均势和国际秩序[A].威廉·奥尔森等.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译本)[C].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167.
- [8]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67.
- [9] 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65.
- [10] Simnina, Haig.1985, The privileged partnership—Franco—German Relation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1969.194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94.
- [11] 维利·勃兰特.人民和政治1960—1975年[M],波士顿1976年版,第236—237页(转引自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第254页).
- [12] 朱民权.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前言17.
- [13] Karl.Koch.West Germany Today 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 P148.149.151.
- [14] 联邦德国新闻局.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179—181.
- [15] 联邦德国新闻局.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82.
- [16] 维利·勃兰特.会见与思考(中译本)[M].商务印书馆,1979:328.

The Role of New Oriental Policy in Promoting the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cess

WANG Fang-fang

(College of Art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After World War II, Federal Germany became a world economic pow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quickly, but there was still a “political gnome” dropping. In the late 1960s, along with the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Federal Germany changed diplomatic policies accordingly, implemented the “new Oriental policy”. Federal Germany leader Willy Brandt always put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new Oriental policy tightly together, this not only relieved tensions between east and west, 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Germany. Meanwhile, the deepening of proces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vided solid backing and security guarantees for the new Oriental policy.

Key words: New Oriental Policy; Joint European; European Integration; Relationship

(责任编辑:胡金频)